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经 / 典 / 补 / 遗 / 系 / 列 /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任天石

卢卡奇早期文选

原著 【匈】 卢卡奇
翻译 张 亮 吴勇立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镜译丛

/ 经 / 典 / 补 / 遗 / 系 / 列 /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任天石

卢卡奇早期文选

原著 【匈】 卢卡奇
翻译 张亮 吴勇立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卢卡奇早期文选/(匈)卢卡奇著:张亮,吴勇立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ISBN 7-305-04022-3

I. 卢... II. ①卢...②张...③吴... III. 卢卡奇,
G. 一文集 IV. B5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4035 号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卢卡奇早期文选
作 者 (匈)卢卡奇
译 者 张 亮 吴勇立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83596923 025-83592317 传真 025-83686347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邮件 nupress1@public1.ptt.js.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字数 180 千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IBSN 7-305-04022-3/B·306
定 价 14.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的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90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做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年秋于南京大学

序 言

本书的第一篇草稿创作于1914年的夏季，最后一篇的定稿则是在1914~1915年的冬季完成的。它最早于1916年发表在马克斯·德索瓦(Max Dessoir)^①编辑的《美学和一般艺术科学》(*Zeitschrift für Ae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杂志上,1920年由柏林的P·卡西尔(P. Cassirer)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写作的直接动机源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源于社会民主党支持战争的态度对左翼知识界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战争,尤其是对战争的狂热支持情绪,我个人的内心深处持一种强烈而全面的拒斥态度,只不过这种拒斥态度最初并没有溢于言表。我想起1914

① 德索瓦(1867~1947年)是柏林大学的教授、《美学和一般艺术科学》杂志的编辑。主要是在卢卡奇当时的保护人马克斯·韦伯的大力斡旋下,德索瓦方才同意接受《小说理论》并把它刊载在该杂志1916年的第3~4期上。——译者注

年晚秋和玛丽安妮·韦伯(Marianne Weber)夫人^①的一次谈话。她对我描述了好些英雄主义的个别具体行动,希望以此反驳我在这方面的抵触态度。我仅仅回答说:“越好,也就越糟(Je besser, desto schlimmer.)”这时,我尝试着用自觉的语言来表述自己情绪化的看法,并大致形成了如下认识:中欧列强(Mittelmächte)^②可能打败俄国,这将导致沙皇统治的垮台,我支持这种结局。但同时也存在着西方国家击败德国的可能性,如果这能够导致霍亨佐伦(Hohenzollern)王朝和哈布斯堡(Habsburger)王朝的垮台,我将同样表示支持。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谁将把我们 from 西方文明的奴役中拯救出来?(如果最终的胜利属于当时的德国,对我而言,这不啻于噩梦般的可怕前景。)

在如此心境中,《小说理论》(*Die Theorie des Romans*)^③的第一稿完成了。一开始我打算采用系列对话的形式:一群害怕受到战争狂热传染的青年人逃出故乡,就像《十日谈》(*Dekameron*)里讲故事的人们逃出瘟疫流行的村庄一样;他们试图通过那些逐步引向本书所讨论的问题——也即对陀思妥

① 玛丽安妮·韦伯是马克斯·韦伯的夫人。1914年以后,卢卡奇和恩斯特·布洛赫一起,作为西美尔的弟子进入海德堡的韦伯圈子,他们强烈的乌托邦弥赛亚主义倾向给韦伯夫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在多年后的回忆中她还曾有所评论(参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阎克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0页)。按照卢卡奇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自传对话中所做的纠正,他与韦伯夫人的这次谈话应当在1914年7、8月间,因为在同年8月给韦伯夫人的一封信中,西美尔曾对此次谈话发表过评论。——译者注

② 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和奥匈帝国,后来也包括保加利亚和土耳其。——译者注

③ 它的全称是《小说理论:关于伟大史诗形式的历史哲学研究》(*Die Theorie des Romans: ein geschichtsphilosophischer Versuch über die Formen der großen Epik*)。——译者注

耶夫斯基 (Dostojewskij) 的世界的看法^①——的对话,实现对自身的理解和相互间的理解。经过更深入的思考,我放弃了这个计划而把书写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因此,本书可以说是在对世界局势的永久绝望的心绪中脱稿的。直到 1917 年,我才找到了直至那时看来都无法解决的问题的答案。

当然,假如仅仅局限在文本自身,就它的客观内容所表达出来的观点,而不参照那些决定它的形成的内在因素,对本书进行考察也是可能的。不过,我相信,在回顾差不多五十年前的那段历史时,记述作品创作过程中的心境是值得的,因为这便于对作品形成正确的理解。

很清楚,我对战争连同对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拒斥心理都是纯粹的乌托邦;即使在最抽象的思维水平上,也没有什么东西能缩短我的主观态度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我起先并没有意识到有必要对自己的世界观、科学的工作方法等进行严格的重新评价。我那时正处于从康德(Kant)转向黑格尔(Hegel)的过程中,但不管怎样,我对于所谓“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lichen)方法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这种态度基本上是来自青年时代阅读狄尔泰(Dilthey)、西美尔(Simmel)、韦伯(Max Weber)著作所留下的种种印象。《小说理论》事实上就

① 卢卡奇的同时代人赫尔曼·黑塞曾说:“在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作品极其明确地表达和预示了我所说的‘欧洲的没落’,其中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得到最为集中的体现。欧洲的青年人,特别是德国的青年人不是把歌德,也不是把尼采,而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是他们的伟大作家,这对于我们的命运似乎有某种决定性的意味。”(赫尔曼·黑塞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斯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5 页)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1914~1915 年间,卢卡奇中断了《海德堡美学》手稿的创作,准备撰写一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后因计划过于庞大而中断,紧接着他就写作了《小说理论》。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情绪得到了充分贯彻,但其人却是在结尾论托尔斯泰处方才被附带地提及。——译者注

是这种精神科学倾向的一个典型产物。1920年,我在维也纳结识马克斯·德伏夏克(Max Dovřák)^①,他告诉我,他认为这部作品是精神科学运动最重要的出版物。

今天,认识到精神科学方法的局限性已没有什么困难了。当然,当我们批判新康德主义或其他实证主义在处理历史人物或历史关系、精神现实(逻辑学、美学等)等问题上所显现出来的肤浅平庸的时候,也应该能够正确理解其相对的历史合理性。例如,我现在就在思考狄尔泰的《体验与诗》(*Das Erlebnis und die Dichtung*,莱比锡1905年版)一书所展现出来的魅力,他的这本书似乎在许多方面都开辟了新局面。这个局面向我们展现为一个在理论层面和历史层面都进行大规模综合的精神世界。但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未曾看到,这种新方法事实上并没有克服实证主义,而且还存在深刻的缺陷,即它的综合其实缺乏客观基础。(那时候,我们中的青年人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有天赋的人并不是通过这种方法达到他们真正令人信服的结论的。)仅仅借助一个学派、一个时代等等——在绝大多数场合只是被直觉地把握到的——几个特性,就形成一般综合概念体系,然后通过推论进行由普遍向个别现象分析的过渡,并以此达到我们所说的全面的观点,这就是当时的时尚。

这也是《小说理论》的方法。对此,请允许我稍加引证。在小说形式的类型学(Typologie)^②中,思想的抉择(gedankli-

① 德伏夏克(1874-1921年)是捷克人,后到维也纳学习艺术史,成为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译者注

② 卢卡奇的小说类型学在方法论上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类型学研究的深刻影响,正是因为这种方法论上的共同性,韦伯方才极力举荐《小说理论》,并力保它能完整地发表。而作为杂志的主编,德索瓦实际上对《小说理论》特别是具有方法论性质的第一部分“一、完整的文化”是相当不满的。具体情况可以参见本书附录中卢卡奇致马克斯·韦伯的两封信。——译者注

che Alternative)——即主人公的内心与现实的关系是过窄还是过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高度抽象的两分法至多适用于对《堂吉诃德》(*Don Quijote*)——此书代表第一种类型——的特定方面的阐述。但是,它太过一般了,以致不能让人完整地领会这部小说的历史丰富性和美学丰富性。至于属于相同类型的其他小说家,如巴尔扎克(Balzac)甚至彭托皮丹(Pontoppidan)^①,却由此被套进了被该方法弄得走了样的概念桎梏中。其他类型的情况也是一样。而以“精神科学”的抽象综合方法在对托尔斯泰(Tolstoi)作品的处理效果中,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彰显。《战争与和平》(*Krieg und Frieden*)的结尾事实上是拿破仑(Napoleon)战争时代纯理想化的终结(ein echter ideeller Abschluß):托尔斯泰在一些角色的发展中已经埋下了伏笔,从中我们可以预见到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Dekabristenaufstand)起义。可《小说理论》的作者却顽固地坚持《情感教育》(*L'Education sentimentale*)的模式,因此,在这里,他能发现的就只是“一种被压抑的气氛,有如幼儿园的孩子被喝令安静一般”,“这比最成问题的幻灭小说的结局更为忧郁”。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只需指出下面的事实就足够了:诸如笛福(Defoe)、菲尔丁(Fielding)和司汤达(Sendhal)等小说家并未出现在这一结构的图式中;《小说理论》的作者运用了任意的综合方法,导致他对巴尔扎克、福楼拜(Flaubert),或者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形成了彻底颠倒的看法。

如果要揭示“精神科学”抽象的综合方法的局限性,那

① 彭托皮丹(1857~1943年)是丹麦现实主义作家,小说笔调冷峭、超然,近似史诗笔法,内容涉及丹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91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第二部分“一、抽象的理想主义”中,卢卡奇对他的小说《幸福的汉斯》曾有专门的评论。——译者注

么,就必须提及这种扭曲。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小说理论》的作者而言,揭示这些饶有趣味的相关性的道路原则上就被排除了。在这里,我又要提及那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对《情感教育》中时间作用的分析。^①虽然它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还太抽象。主要是依据小说的最后部分(在1848年革命最终失败之后),它“对消失了的时间进行探究的可能性”的发现最终还是得到了客观的证实。也就是说,仅仅根据柏格森(Bergson)的“绵延”(duree)概念,我们就对小说中时间的新功能有了一个清晰的系统理解。考虑到普鲁斯特(Proust)直到1920年以后在德国才为人所知,乔伊斯(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的成名时间是1922年,而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Zauberberg*)直到1924年才获出版,那么,这些成就就更令人瞩目了。

所以说,《小说理论》是“精神科学”的典型产物,它并没有指明超越其方法论局限性的道路。但是,它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托马斯·曼和马克斯·韦伯都属持赞同态度的读者之列)。虽然植根于“精神科学”的方法,但在特定的范围内,这本书的确已经显现出了某些在以后的发展中显得极为重要的特征。我们已经指出,《小说理论》的作者已是一位黑格尔主义者了。“精神科学”方法的老一辈代表人物是以康德哲学为基础的,尚没有脱离实证主义的窠臼;这一点在狄尔泰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克服实证论单调的理性主义的企图,差不多也就意味着向非理性主义方向的开步;这既适用于西美尔,也适用于狄尔泰自己。黑格尔的复兴的确在战前几年就已经开始了。不过,对这种复兴真正严谨的科学兴趣大多被限定在逻辑学和一般科学理论领域。据我所知,《小说理论》

① 参见第二部分“二、幻灭的浪漫主义”。——译者注

是“精神科学”中第一部将黑格尔哲学的发现成果具体地运用到美学问题中的著作。本书第一大部分的大多数段落基本上都采用了黑格尔的理论,例如史诗和戏剧艺术的总体模式比较、史诗和小说在历史哲学观念上的异同,等等。^①但《小说理论》的作者不是一位绝对的或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歌德(Goethe)、席勒(Schiller)的分析,歌德晚期所运用的某些概念(如超凡性 Dämonen),青年弗·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和索尔格(Solger)^②的美学理论(作为一种现代赋形方法的反讽 Ironie),都对黑格尔的一般轮廓起到了补充和具体化的作用。

美学范畴的历史化或许是黑格尔更重要的一项遗产。在美学领域中,这是黑格尔复兴所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像李凯尔特(Rickert)及其学派这样的康德主义者,在永恒的价值和价值的历史实现之间设置了一道方法论沟壑。虽然狄尔泰认为这个矛盾并不显著,但在他为哲学史方法描绘的草图中,他同样没有能够达到对建立一个元历史的哲学类型学——而后它们将在具体的变异中得以历史的实现——的突破。在一些美学分析的个案中,他获得了成功,但在一定意义上,他却如此懵懂,并肯定没有意识到要去创立一种新的方法论。这种建立在哲学保守主义基础上的世界观表达了“精神科学”主要代表人物的保守的历史政治态度。这种态度理智地回到了兰克(Ranke)的立场,和黑格尔世界精神辩证发展的观念构成了尖锐冲突。当然,也有实证论的历史相对主义。战争

① 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三章 诗”,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译者注

② 索尔格(1780~1818年)是德国浪漫派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之一,曾提出了诗歌的滑稽说。在美学上,他步谢林后尘,在某些方面趋向于黑格尔。——译者注

期间,施宾格勒(Spengler)就是这么做的,他将所有范畴都绝对地历史化,否认任何无论是美学的、伦理学的还是逻辑学的超历史的合法性的存在,并由此把这一方法和“精神科学”的倾向融合在了一起。这样,他就从自己那方面取消了统一的历史进程:极端的历史变化理论实际上变成了一种静止的观点,并最终取消了历史本身,走向总是终结然后紧接着重新开始的、内部分裂的文化循环的序列;一个与兰克分庭抗礼的对立面就此形成了。

但《小说理论》的作者没有走得这么远。当时他正在寻找文学类型的一种普遍辩证法,这是历史地建筑在美学范畴和文学形式的真实本质基础上的普遍辩证法,他力求在范畴和历史之间,找到较之于他在黑格尔那里发现的更为紧密的联系;他力图理智地理解变化中的永恒,理解本质在持久合法性范围中的内在变化。但他的方法在许多方面——包括在许多非常重要的关联上——都还很抽象,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历史现实。虽然已经指出来了,但它当时是不断地导致任意的建构。直到15年后——当然已经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我才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大林(Stalin)时代,当里夫希茨(M. A. Lifshitz)^①和我与各式各样粗陋的社会学相对立,力图揭示马克思真实的美学并进一步发展它时,我们获得了一个真正历史的系统方法。《小说理论》仅仅意味着一个尝试,可惜其无论在设计方面还是执行方面都是失败的,不过,与它同时代人能做到的相比,它确实在目的上要更接近于问题的解决。

本书感到棘手的美学的“当下”(Gegenwart)问题同样属

^① 里夫希茨(1905~1983年)是卢卡奇在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同事和理论合作者,著有《论马克思艺术观点的发展》(1933年)。——译者注

于黑格尔的遗产：我指的是这样一个观念，即从历史哲学的观点来看，发展导致对决定当下的艺术演化的诸美学原则的取消。在黑格尔那里，作为这种观念的一个理论结果，只有艺术被认为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当他从美学的角度界定这个情状时，“散文世界”（Welt der Prosa）^①就是精神在思想和社会国家实践中都得到实现的领域。既然现实已经变得不成问题，那么艺术就变得问题重重的了。《小说理论》提出的观念，虽然形式相似但事实上正相反：小说形式问题不过是已经破碎的世界的镜像。这就是为什么和其他种种文学形式相比，“生活散文”（Prosa des Lebens）仅仅象征着现实不再为艺术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小说的中心问题就是必须扣除（Abrechnung）源于存在的完整性的总体的封闭的形式——艺术与生来完整的形式世界毫无关系。这不是因为艺术而是因为历史哲学的理由：因为“不再有自发的存在总体”了，《小说理论》的作者讲述的就是今天的现实。几年后，哥特富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②以其他方式提出了类似思想：“不再有现实，有的至多只是它扭曲的影像。”^③虽然《小说理论》在自体论的意义上比表现主义诗人们更具有批判精神、更深刻，不过，两者俱以类似的生活方式表达了对生活类似的感受和对现状的类似反应。在30年代关于表现主义和

① 关于“散文世界”和“生活散文”，请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167～168页。——译者注

② 哥特富里德·贝恩（1886～1956年）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重要的表现主义诗人和杂文作家，1912年曾出版诗集《陈尸所》，在《小说理论》中，这一意象得到了吸收。希特勒上台后，他发表题为《新国家与知识分子》的广播演说，公开支持纳粹政权。这一事件成为后来将卢卡奇、布莱希特等都卷进去的“表现主义争论”的起因。——译者注

③ 《表现主义的教义》（*Bekennnis zum Expressionismus*），原刊登于1933年11月5日的《德国的未来》（*Deutsche Zukunft*），现收入D·韦勒斯霍夫（D. Wellerhoff）编辑的《全集》第一卷，威斯巴顿1959年版，第245页。

现实主义的争论中,这引起了一种多少有些怪诞的局面: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在激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格奥尔格·卢卡奇时却乞灵于《小说理论》。^①

从本质上讲,《小说理论》和作为一般方法论导师的黑格尔之间的对立主要体现为社会的、而非美学的和哲学的对立,这一点非常清楚。只要回忆一下本文开头提及的作者对战争的态度,就能充分说明这个问题。需要补充的是,那时他对社会现实的见解受到索列尔(Sorel)^②的强烈影响。所以,《小说理论》中不用黑格尔的术语,而是套用费希特(Fichte)的话将现时代定性为“无以复加的罪恶时代”。这是一种具有伦理色彩的现实悲观主义,但无论如何,这也不意味着从黑格尔向费希特的全面倒退,而毋宁说是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克尔凯郭尔化(Kierkegaard)。克尔凯郭尔对《小说理论》的作者一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克尔凯郭尔时髦起来以前很久,他已经就克尔凯郭尔的生平与思想的关系写了一篇论文^③。在战前的海德堡时期,他曾致力于研究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的批判,只是这研究没有完成。提及上述事实并不是出于传记的考虑,而是为了指明一种在德国思想中后来变得很重要的发

① 关于卢卡奇与布洛赫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请参见卢卡奇、布莱希特等著、张黎编选的《表现主义争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但需要说明的,发生变化的是卢卡奇本人,而不是恪守自己青年时代理论立场的布洛赫。就此而论,布洛赫乞灵于《小说理论》也就是重申自己的立场,这并不“怪诞”。——译者注

② 乔治·索列尔(1847~1922年)是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工团主义理论家,其代表作作为1908年的《暴力论》。在他看来,暴力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革命的否定,国家的武力则是强制的力量;人性并不本善,因此,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不可能自然生成,而必须诉诸革命行动。——译者注

③ 《生活和形式的碰撞》(*Das Zerschellen der Form am Leben*),写于1909年,收集在《心灵与形式》(*Die Seele und die Formen*)中(柏林1911年),具体参见本文集的第二部分。——译者注

展趋势。确实,克尔凯郭尔的直接影响是与海德格尔(Heidegger)和雅斯贝斯(Jaspers)的存在哲学相衔接的,它或多或少开辟了一条公然对抗黑格路的道路。但不能忽略的是,黑格尔哲学复兴的孜孜以求的目的就在于努力缩小黑格尔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这种趋势在狄尔泰1905年对青年黑格尔的研究中就已经可以察觉到了,^①而当1924年克洛纳(Kroner)宣称黑格尔是哲学史上最大的非理性主义者时,^②它就具有了明确的表现形式。虽然克尔凯郭尔的直接影响此时还未能得到证实,可到了20年代,它就以潜在的但却日益深化的方式无处不在了,它甚至逐步导致了对青年马克思的克尔凯郭尔化。例如,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③1941年就写道:“尽管(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相互距离很远,但他们却在两个方面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对现实存在的共同抨击和同源于黑格尔这一事实。”(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去指明,在当代法国哲学中,这一倾向流传得有多广了。)

浪漫的反资本主义立场在哲学和政治上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是这些理论的社会哲学基础。它最早——大约在青年卡莱尔(Carlyle)^④和科贝特(Cobbett)^⑤那里——表现为对早期

① 指的是狄尔泰的《黑格尔的青年时代》一文。——译者注

② 指的是克洛纳(1884年~?年)的《从康德到黑格尔》一书。——译者注

③ 卡尔·洛维特(1897~1973年)是德国现代哲学家和哲学史家,著有《从黑格尔到尼采——19世纪思想中的革命性断裂》(1941年)等书。——译者注

④ 卡莱尔(1795~1881年)是英国作家和历史学家,曾在浪漫主义的立场上对英国资本主义进行过猛烈抨击,代表作是1843年出版的《过去与现在》。1844年,恩格斯曾为此书写过一篇书评(《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译者注

⑤ 科贝特(1763~1835年)是19世纪英格兰最伟大的新闻记者和最勇敢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的政治理想是重建早期英格兰社会,而他所理解的英格兰没有政党,没有国债,没有工厂,各个阶级和睦相处。——译者注

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恐怖和野蛮的真正批判,有时,比如在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中,它甚至表现为社会主义批判的初级形式。而在德国,这一态度则逐步转化为对霍亨佐伦罗帝国政治和社会的落后状态的辩护。从表面上看,像托马斯·曼的《一个非政治的人的沉思》(*Betrachtungen eins Unpolitischen*, 1918年)这样一部重要的战时作品也有这一倾向。不过,托马斯·曼在20年代的发展则证实他对这部作品的自我描绘是极为合理的:“它是以极重要的方式进行的掩护退却的战斗,是德国浪漫的资产阶级精神的最新和最后的抗拒,是已经被充分意识到没有希望的战斗……(它)甚至对精神不健康和对濒死的事物的非道德的所有同情心都具有深刻的洞察力。”

在《小说理论》作者身上,我们没有发现上述情绪的丝毫踪迹,尽管他的哲学起点是由黑格尔、歌德和浪漫派提供的。他对资本主义人性丧失的现状的抗拒,使得他对“德国人的惨况”以及他们在当代的残余不留任何同情,这一点与托马斯·曼迥然不同。在本质上,《小说理论》不是保守的而是颠覆性的,虽然它建立在非常天真、彻底虚幻的乌托邦的基础之上——这种幻想以为人应该具有的自然生活能够从资本主义的分裂中产生,也能从与这种分裂相一致的、无生命和敌视生命的社会和经济范畴的毁灭中一下子产生出来。在对托尔斯泰的分析中,本书达到了它的理论顶点,这一事实连同作者对“不写小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清晰地表明,作者不是在寻找什么新的文学形式,确切地说,是在追寻一个“新世界”。我们自然会对这种原始的乌托邦报以微笑,但正是它传达出了存在于那个时代的一种思潮。不过,利用社会的方法来超越经济世界这种观念,到了20年代,渐渐地并越来越凸现出其反动的特征。而在创作《小说理论》的时候,这些思